

红岩英魂逢春记

孟勇 戴晴 李家杰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53/67

红岩英魂逢春记

孟 勇 戴 晴 李家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3228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943228

红岩英魂逢春记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25 字数 36 千

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300 册

书号：11118·130

定价：0.19 元

目 录

拂去历史的尘埃

——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复查小组工作纪实

.....戴 晴 李家杰 (1)

红岩英魂逢春记

——中美合作所殉难人员复查纪实

.....孟 勇 (19)

拂去历史的尘埃

——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复查小组工作纪实

戴 晴 李家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刘邓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抵山城重庆，当市区已经隐约听到南岸隆隆的炮声的时候，一场震惊中外的暴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对在押政治犯的大屠杀开始了。歌乐山坳遗下三百多具惨不忍睹的遗骸……

一个半月之后，重庆各界人民，在青年馆大礼堂举行被难烈士追悼大会。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披着战地的硝烟，匆匆赶来祭奠英烈，鞠躬致敬。主祭人张际春副政委把鲜花和鲜果奉献到烈士灵前。在松柏与鲜花丛中，透过披了黑纱的画框，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宋绮云、许晓轩、江竹筠……安详地望着自己的同志、自己的人民。他们是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还有其他民主人士，一共二百三十六名。

二百三十六名！但中美合作所抗战胜利以来在各个

集中营被屠杀的英烈是三百三十一位，另外九十五人呢？

随着运载杨将军灵柩的庆华轮在嘉陵江畔一声长鸣，历史匆匆地前行了。象一位重任在身的家长，它无暇驻足去解那繁难的结。九十五人，他们是谁？他们做过什么？为什么在他们洒尽最后一滴鲜血之后，却无缘接受那至诚的祭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日，四川省委组织部接到中组部函示，上级要他们组织力量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未定烈士被害人进行全面复审。

翻开发黄的卷宗，按照一九五〇年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定，这九十五人中，有的定为叛徒，自首，托派，还有的不列名或材料不详。从辨认收殓遗体到追悼大会，审定委员会只工作了一个半月。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是兢兢业业尽了我们底力量从事这项工作的，但我们自知将仍不免于错误。”

复查小组开始工作。十八个月来，他们翻山越岭、穷追紧索，凡是有着弹痕的地方，又重印上他们的足迹；凡是载着往事的残页，都在他们手上反复阅览。他们无暇休息娱乐，也难得和家人晤面，因为捧在他们手上的，是一宗宗多么繁难的疑案……

在党成立六十二周年前夕，复查小组终于以比较翔

实可靠的材料、证据，认定九十五人中的六十人应改定为烈士。目下，经省委组织部复查，四川省有关部门正在报请省人民政府补办追认手续。

现在，且让我们轻叩复查工作小组的门，走进他们简朴的办公室，打开他们汗渍斑斑的笔记本吧！

双枪老太婆是叛徒么？

读过小说《红岩》的人，有谁会忘记那叱咤风云的双枪老太婆呢？

双枪老太婆生活中的原型名叫张惠中，出身在四川岳池县城关镇一个旧世家。在万县女中肄业的时候，她就是一个热情向上、泼辣果断的姑娘。一九三八年，她的丈夫邓福谦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怀着对丈夫的无限深情和钦敬，她更名为邓惠中。她一面在家乡办学，一面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一九三九年她参加了共产党，接着担任妇女特支书记、县妇女委员。她走乡串户，发动群众，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到一九四八年，这位年届中年的小学校长，已经成为华蓥山一带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在战斗中，她负责后勤供应。队伍打到哪里， she 就把新入伍的战士和钱粮运到哪里，甚至变卖家产，为部队购买枪枝弹药。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形势非常

险恶，在困难面前，她没有回避，主动找到组织，表示决心说：“今天要人今天到，明天要人明天到，短枪不够，想办法到敌人内部去搞……”

孩子们在母亲的影响下，从小就读进步书刊，还替叔叔伯伯们送饭、放哨、侦察敌情。一次，小兄弟俩争论人究竟为什么活着，争论世界上有没有从来不替自己着想的人。后来同母亲一同牺牲在渣滓洞监狱的邓诚喊道：

“怎么没有，哪个讲没有，妈不就是么？”

起义失败以后，邓惠中全家四口——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十九岁的未婚儿媳，在三天之内相继遭到逮捕。

从外表看，邓惠中是一个相当文弱的妇人，就连敌人也难于想象这文质彬彬的女校长就是传说中夜行三十里，弹无虚发的双枪老太婆。邓惠中当然什么也不承认，于是吊打、上老虎凳……她那年四十五岁，特务们折磨她的毒辣手段，是令人发指的。用当时看守的话讲，“这女匪首口硬得很，不说一点情况。”直到告密人出场，邓惠中才知道一切已经暴露无遗。她承认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讲了他们已告失败的起义……敌人说她是妇道人家，又是知书识礼有学问的人，问她何不到国民党这边来干事。她回答说：“你们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办了哪一件好事？空喊男女平等，女子在

政治上、经济上哪一点说得上平等？我是妇女，我首先就要反对你们，打倒你们！”

十天之后，敌人将她和她的一個儿子作为重犯押到渣滓洞。一年零两个月后，母子同时在大屠杀中殉难。

渣滓洞的战友们，都记得这身体瘦弱却乐观和气的邓妈妈。一九四八年春节联欢的时候，她带头扭秧歌。狱中两位女难友生孩子，全靠她照料。

那末，邓惠中遇难后怎么没有被定为烈士呢？

一九五〇年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有一位名叫李仲玄的青年遭到逮捕与她有关，因此将邓惠中定为叛徒。

是的，有李仲玄这样一个人。他在邓惠中入狱后被捕，也被关在渣滓洞，一九四九年在“大屠杀”中牺牲。

复查小组走访了所有能找到的当时的地下党员、脱险难友，翻遍能到手的敌伪档案，终于弄清，李仲玄是邓惠中儿子的同学，起义失败后，已经离开岳池，回到重庆。邓惠中在刑讯中确实提起过他，说他是重庆学生，但是，这就是他被捕的直接原因么？反复查找之后，小组又发现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说明，早在邓惠中说到李仲玄的前十天，有个叛徒已将李仲玄供出。李的被捕与邓惠中没有关系。与此同时，据邓惠中的直接领导人、当时川东九工委书记朱光璧同志证明，邓惠中被捕

后，凡是她熟悉的人，包括朱本人、九工委联络员邓淑华，还有和她同一支部的几个同志，邓惠中虽熟知他们的活动与住址，他们却没有一个受到牵连。

查出这一切，复查组的同志难于抑制内心的激动。邓惠中同志把她身家性命全部无保留地献给了革命，应当追认为烈士。

这一对夫妇是托派么？

白公馆楼下重犯二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关着一对夫妇，丈夫是东北人，妻子是广西人。他们是在大屠杀前夕被提出去枪毙的。临刑时，夫妻同铐一副手铐，每人手上抱了一个孩子。他们从走廊上走过，用眼睛向伏在放风口的难友告别，神色泰然、镇定。

一九五〇年烈士资格审定委员会档案这样记载：王振华、黎洁霜，托派，不定烈士。

是托派么？是。一九三四年，王振华在北大读经济系的时候，曾和学联中一批托派学生到南京请愿，被学校开除。后来在上海会晤彭述之，又到香港、重庆等地从事托派活动。他的文章漂亮，人又有很 强 的 活动能力，并且公开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吸引了一大批思想激进的学生。他的活动违反了托派的纲领，因此一直

被认为不忠诚，最后被托派中央开除。王振华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编的刊物《工人之声》被抄获。他在狱中并不隐讳他曾是托派的身份，但也不与共产党员们争论或斗争。王的未婚妻黎洁霜，本是一个青年学生，因为仰慕王振华，离开家乡梧州，追随他到重庆。因为在王振华那儿搜出她的信和照片，她也被牵进去了，这本来很容易开脱，但她不愿离开自己罹难的爱人，于是也自称托派，随未婚夫入狱。

他们先被解到贵州息烽，分别囚在不同的牢房。在这里，象他们这样的案情，本来可能有不止一次的获释机会。但王振华由于思想左倾幼稚，行动过火，常把特务们弄得十分恼怒。五年之后，又被押回白公馆。他们的婚礼，是在狱中举行的。

长年的牢狱生活，和共产党人的朝夕相处，特别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彻底教育了桀骜不驯的王振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公开赞扬共产党人的情操，并带领全家，包括两个婴儿，参加监狱党支部组织的绝食斗争。不少难友都记得两个小娃儿饿得啼哭不止的情景。四九年十月七日，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歌、国旗、毛主席、周总理等等消息之后，不顾危险，激动地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转述给不能放风的共产党员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陈然（《红岩》

中成岗的原型)。这时，他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共产党的主张。

他们夫妻在狱中养下两个儿子，王小华、王又华。当时白公馆管理员杨进兴（《红岩》中的猩猩）曾经提出把小华抱给他做儿子，交换条件是给他们减刑。面对这个以残害革命志士为职业的刽子手，黎洁霜气得浑身发抖。她说：“我的孩子就是掐死，也不能给你这个乌龟王八！”临刑时，看到紧紧地伏在大人身上的兄弟俩，母亲的心受不住了。她转过身请求特务：“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吧……”特务们一阵狞笑。王振华高声喝断她：“不要多说了！”特务一把抓过孩子，就在他们眼前，将这两个不曾见过天日的小生命，残杀在血泊之中。守在窗口的难友，听见他们夫妻最后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复查小组同志认为，他们曾经走过弯路，究其原因，是思想上的幼稚与偏激。这一对夫妇在狱中光明磊落，牺牲得英勇壮烈，应该做为革命烈士得到追认。

她为什么“自首”？

胡芳玉，是世家出身的小姐。当她从重庆育才学校社会班毕业，怀着满腔热情到中共南方局青委会报到的

时候，只有二十岁。她热情活跃，虽然同志们把她戏称做“猫儿小姐”，但在艰苦危险的工作中从没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娇气。她到天府煤矿教小学、搞工运，到梁平大树准备武装起义，她奔走呼号于城镇乡村，泼辣老练得象一个久经摔打的战士。当时党的经费不宽裕，她不时地向父亲要钱，有一次还捐过五十担田租，用来买枪械弹药。应该说，在信念上，她完全背叛了她出身的富裕的家庭。但血缘上不可割断的联系，却给她短暂的革命生涯带来意想不到的周折。

武装起义失败以后，敌人开展了大规模的清乡围剿。组织上安排她返乡，一则坚壁枪枝，二则躲躲风头。她躲在已经出嫁的么姑家，当通缉的风声越来越紧的时候，父亲竟几次奉族长之命带信令她自杀。没过多久，敌人逮捕了所有和她有关的人——父母、亲友、邻里，逼着她的舅父引路，前往捉拿她这个“共党要犯”。舅父在乱石窖里把她找到，路上却又把这“作乱”的甥女放了。她本来可以逃脱，然而，当她得知父母被打得死去活来、姐姐妹妹有家不得归，四周同情革命的群众也遭牵连的时候，终于在一个晚上，只身来到伪乡政府。

“我就是胡芳玉，把我送县吧！”她平静地说。

从敌伪档案得知，她受了很重的刑，却不吐一句真

情。她的父亲和舅舅赶来要替她履行自新手续；乡长知道了，坐了滑竿来催案——“要是不杀胡芳玉，虎城的共产党清不了！”因为在县里取不下口供，她被押解到渣滓洞。一年零九个月之后，她和江竹筠一道，被第一批提出去，枪杀在电台岚垭。

一九五〇年，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她定为自首。是的，她是自己去投案的。但挺身而出的动机不是放弃信仰谋求生路，而是用牺牲自己来搭救无辜受牵连的人。狱中的难友都记得这个活泼、纯朴、充满了生的渴望的小妹妹。有一次，她对一个倾向革命的看守黄茂才说：“黄先生，我们以后出去，大家来建设社会主义，多好玩！”

她没有看到这一天。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她的所作所为甚至不被理解。但这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这次，她被追认为烈士。

一个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委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个受过七小时电刑，又被打得皮开肉绽的青年学者，被丢进渣滓洞牢房。两个月之后，国统区报纸刊登了一条因有四大罪状，将原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薛传道“永远开除出党”的消息。十一月二

十七日大屠杀之后，人们在收殓遗体时，发现了他的金属眼镜框和衬衣残片。

一个国民党高官怎么会被投入牢房并遭杀害呢？

薛传道出身贫苦，自幼聪颖过人，十六岁即考入南京中央工校，成绩优异，后又入交通大学，一九四六年回到已经西迁成都的中央工校任教。他在政治上不甘平庸，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参加三青团，组织活力社，投身青年军，办起《中工半月刊》，还出席了一九四六年三青团在庐山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因为他痛斥国民党的腐败，力主革新，得到青年们的拥护，当选为候补全国监委。党团合并后，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候补监委。

一九四七年之后，看到国民党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他思想非常苦闷，开始向进步的教授靠拢，参加读书会。当他的曾经是共产党员的妻子决定回浙江寻找已经失去联系的关系的时候，薛传道对她说：“放心，我不会走和你相反的政治道路。”

薛传道是因为共产党员嫌疑被捕的。搜捕前夕，伪警察局沙坪坝派出所所长曾到工校校长家里报信，让他逃走。他说自己没有什么问题，不打算走。被捕之后，狱方又以释放为条件，诱他参加特务组织，遭到严辞拒绝。他被整整拷打了一夜，上电刑、坐老虎凳，待到最

后在难友们的掩护下，和妻子匆匆面别的时候，他告诉她，自己对死早有准备，没什么了不起。

从幸存的同室难友口中得知，薛传道在狱中很少说话，只是一味读书。家里送来的罐头，他总是与难友同食。他曾为一个死去的难友主持丧仪，沉痛哀悼……

薛传道坚持自己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实践而确立的信念。他的道路有过曲折，但他终于转向了人民。一九五〇年，审查委员会因他在国民党中的职位，定为“不列名”。复查组这次认为，应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一起军统特务案的真相

一九四〇年，控制严密的国民党军统局发生了一起让戴笠暴跳如雷的案子：电讯处报务主任和另外五名报务员，居然通过一个年轻的女郎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发生了关系，不但将名册、呼号、密码全部泄露，其中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戴笠立即签报蒋介石批准，将同案七人判处死刑。为了将来在和共产党打交道时手里多一张牌，暂不执行，留作人质，带重镣监禁在贵州息烽。

然而，这只是特务们根据现场搜出的字条、底本、

登记员做出的推测。刑讯中，什么口供也没得到。那个充任联络的女郎张露萍，一口咬定她只是和报务员中一个叫张蔚林的在恋爱，别的人全是普通朋友……一九五〇年，资格审查委员会因为找不到他们与地下党发生过联系的确凿证据，而他们军统人员的身份又是明摆着的，于是定为“不提名”。

他们都很年轻，被害的时候，最大的不过三十岁。因为军统控制得严，没有一人成家。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人来认亲，也没有谁关心他们的案情，这七名从容就义的年轻人似乎背着特务的恶名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他们是谁呢？

一九三八年，延安抗大来了一个活泼漂亮的四川姑娘，她名叫黎琳，只有十七岁，爱跳、爱笑、爱打球、爱演戏，有时候还因为想吃成都的米花糖噘起嘴巴。同志们唱歌的时候，她上去打拍子，总喜欢起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于是大家都叫她“干一场”。不过一年多一点时间，这清风一样旋来的姑娘又象清风一样消失了，就连她新婚的丈夫，也只在她走后不久接到一封依依惜别的信，后来又有人带给他一包糖和一张便条，从此音讯杳然。不久，消息传来，她本是军阀的姨太太，吃不了苦，又回去当小姐了；也有人说，到底干过两天共产党，回去就被捕叛变了。斗争残酷又复